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第五冊

近代外國史研究論集

大陸雜誌社印行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三輯

第五冊

近代外國史



大陸雜誌社印行

1377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初版

大陸雜誌史學叢書 第三輯

全五冊

每部精裝定價新台幣
一、五〇〇元
二、五〇〇元

編輯者：大陸雜誌社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大陸雜誌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一二號三樓
電話第三三三二六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八九九號

印刷者：大信印書館

台北市長沙街二段一一九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內政部出版事業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〇〇二四號

梁啓超之迎拒虛無主義	增田涉著 張朋園	一三九
梁啓超逃亡日本始末	石璋如	一四四
董彥堂先生在昆明	陳世材	一五三
聯合國的新趨勢	李亦園	一五五
馬來亞華人的遭遇與處境	潘重規	一六一
朝鮮李朝著述中反清復明之思想	李光海	一七九
記朝鮮實錄中之「鑄字」	王啓宗	一八一
豐臣秀吉侵犯朝鮮之原因	居 蜜	一八六
萊布尼茲等的啓明運動所受中國之影響	吳 翊	一九三
宋卡吳國主史	蘭 又	二〇〇
耶穌成生說之研究	吳 景	二〇二
華人對於菲律賓文化的貢獻	吳 景	二二一
西班牙時代第一階段中菲關係之探討	徐 先	二二一
邁乃克歷史思想的形成	楊 樹	二五九
黃金與國際金融問題	徐 玉	二七五
「東南亞」對中國印度間貿易之貢獻考	于 宗	二八八
賽伊市場法則的源流及爭辯	王 家	二九五
海國圖志對於日本之影響	江 榮	三一八
明治維新史學論略	羅 香	三二七
蘇吉丹與中國之交通及其所出銻石	羅 香	三三五

歐洲的雕版印刷術	胡志偉譯	三三八
白樂日評傳	陳祥龍	三四三

近代化及近代中國之初期

Kunihiko Higashimura
王綱領譯

「近代化」(Modernization)一詞常被濫情地使用於說明十九、二十世紀非西方民族(Non-Western Peoples)的變遷，首用此詞以描述發展的國家為日本、中國、土耳其，二次大戰後，亞非新興國家亦無不然。

近十五年來，此現象之研究，在美國等許多國家的勢力之下，已有相當的成績。其動機一為對一民族或社會作更進一步的認識，一為鑑定共同特質，藉以對人類一般的行為作進一步的瞭解。最後則在為一些開發中的國家再一推動或影響的特殊方向。

由於使用此語者之目的、方法及認識程度不一，直至今日，近代化的意義經常混淆。廣義的說法，認為近代化是一個社會對於其制度、觀念及實際運用的新陳代謝的過程。照這樣說來，任何時代，只要有根本的改變，就要算是近代化。即如清朝初期及緊接着文藝復興那段時期的西歐也要說是近代化了。我們在這裏所要說的近代化是狹義的，那就是非西方國家受西方國家或半西方化國家(如日本、中國)的規範所激勵而作的一種深入的改變。

有些學者喜歡把西方化(Westernization)當做近代化，以為除了西方的典範外，再也找不到其他足以影響他人的東西。我(原作者)以下通稱一個個人則用中立性的字眼，因為非西方國家對於西方文化只是部份的選擇，並非把它拿來作為其正統文化的替身。提起西方化，我們要知道，早在十九世紀初，西方就有兩股影響(他人)的潮流，一股從西歐、美國，到了日本就滲入日本成份；另一股則出自蘇俄，但近年來，加入中國成份則日見其增。

開闢中之非西方國家的主要改革來源出自西方，及這些國家儘管國情與西方不同，仍不得不與西方國家交接之事實，說明這些國家都有共同之處(儘管地理因素與歷史文化不同)，而最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在新興國家的未來發展上，傳統或近代化孰重的問題，但是想要為此問題作答，即使是西化的先進國家(如日本)，仍為時尚早。主

要的問題是，今年認為現代的，明年就不見得為現代的了。

至今，大部份近代化的學術性分析已被帶到特殊的學科環境裏，這一點，我們不難從學術的區分化，及專家學者之不顧對泛泛之論的外行漢子以作鑑定評論得到瞭解。專門研究的優點在於增進研究的精密及分析的巧辯，其缺點在於當對一種文化只擇取一特定的部份而忽略其他重要部份時，就不免面解事理了，甚至在此學科之中，只專研特定的制度或活動時，不免易於曲解事理，而且學者本身往往迷失其中。

如果公認，近代化的研討需要借助於補助學科(interdisciplinary)，儘管這種趨勢發展到其他學問上去，或者要等到各補助學科的所有資料已經搜集並分析完畢，才能應用到(近代化的問題上)。而由補助學科來研究特定的文化可能是最容易的方法，因為補助學科的學者，儘管其以大部份的時間從事其本科的研究，但是他們並不缺乏整體文化的觀念與知識。

一九六〇年，在日本箱根(Hakone)舉行一次討論有關近代化廣義的會議，此會議過後，即有約翰惠特尼·雷爾(John Whitney, III)的「改變中的日本近代化之態度」一篇報導文章產生，與會的三十位日本學者，都出身英美日的高等學府，富於學術，精於文學理論，苦思於近代化之定義。此會議有一特別的優點，即部份與會人士，皆曉馬克斯主義，而能排除過度影響於亞洲之西方資本主義對此題目之偏見。會議之初，有關近代化之詳細討論都加以蒐集，但是被認為範圍有所侷限，尤其是學科本身的特殊難題很多，因此再經一次更詳細討論的結果，訂立下列八個近代化標準。

- (一)機械力作相對高度的集中及整個社會的城鎮漸形集中化。
- (二)機械力作相對高度的使用，貨物廣泛的流通，以及公共服務機關的成長。
- (三)社會成員在空間上廣泛的交互行為，及對政治、經濟事務

的多方參與。

(四) 地方性的及世界的社會團體大肆崩潰，以導致個人在社會的變動性增大及活動範圍的增廣。

(五) 現世觀點的傳佈、科學知識的漸增，以及對環境獨立的傾向隨著教育程度而擴展。

(六) 廣密深入的交通網。

(七) 大規模的社會制度（如行政、工商業）及其官僚組織之增進。

(八) 國家的統一，國際關係的增進。

上列各項雖有以管窺天之嫌，但我仍以為尚有與他國共通之處。這種程序有二種好處。第一、它可以強迫學者破除偏狹心及偏見去充實其他國度的學問，蓋偏狹心與偏見出諸專研一種文化而忽略其他可能的發展，或因忽略而減少其他部份的重要性。第二種好處為可發現有何足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部份。

雖然吾人並不完全同意指稱會議的論點，但吾人想像即使是贊同此論點的人，經過一番研究以後，也會有所修飾的。而這些標準即可印證民國八年以前之中國，蓋五四運動乃是中國人企圖反抗傳統破舊文化而建立新中國之里程碑。

從近代的經濟發展來看，我覺得尚有加入「個人投資額之增加」一項的心要。而且，我相信研討近代化，我們必須注意「評價的改變」，雖然這個名詞很模糊，不易界定，印尼史家索加摩科(Social rank)說得好：「我們容易被政治、社會、經濟的資料所左右，以致於忽略在人類與社會之間的一般強力的推動力量。」由上列八種標準的評價常在改變，因此「評價的改變」遂不能視為近代社會的單項特徵。然而，在這些標題之下，我們容易忽視此事，因此，我想在末了之際，探求中國傳統價值體系有多大的改變。

現在應用此八項標準來看看五四運動以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程度如何。

(一) 城市人口相當高度的集中及整個社會的城鎮新形集中化。

中國雖然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卻也不乏大城市的存在。十九世紀末，現代交通及工商業的發展，大大刺激都市的成長。最先形成的則為外人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地區，不幸地，中國在此期缺乏可靠的人口統計資料，而零星蒐集的少部份資料而不足以說明都市化的趨向。儘管有些都市人口相當地增加，但是並不能證明那時中國都市人口的比例要比八十年前甚高。八十年前所增高。

城鎮集中(Urban-Centeredness)的尺度可視農人口依賴社會的城鎮圍孤的情況而定。民國八年以前，這種尺度是微乎其微的。二十世紀的初期二十年間，中國的手工業都被現代的工廠摧殘殆盡。從一八八〇到一九一九，中國棉織品的進口數目激增，外人視為外國大宗。工廠中比之以前，許多人靠此維持家庭生活，但是佔整個中國的人口比率很少。此外，鄉村依賴都市的地方，就是都市供給鄉村予思想、消息及決策方針。關於此點，吾人雖找不到切實的資料印證，但是，由於交通的改良，比價依賴程度的增加，當不致於有所疑問的。

(二) 機械力作相對高度的使用，貨物廣泛的流通，以及公共服務機關的成長。

由於勞力的通利及資本的短缺，中國人對非生命動力(Inanimate energy)的運用始終抬不起頭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人把定置蒸汽機介紹到中國，七十年代就有汽船公司的設立，從此中國開始提倡使用蒸汽機器。南京、上海、福州、天津續有現代兵工廠和船塢的出現，此後廿五年中，地方政府續建汽船公司一、鐵路二、開礦場二及鐵工廠一。一八八二年外人始置發電機於中國，一八九〇年，中國人自己開始使用電力，並於廣東設廠。

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中，雖然有若干電力操縱的紡織及絲織機的建立，但是現代輕工業的增進，實在馬關條約獲准許所有外人入境設廠所激起，外人私營及中外合營機構的設立如復舊時，特別是上海的紡織業，更極一時之盛。中日甲午戰後，在外人租借及投資之下，鐵路亦開始開闢。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後，日人方面，則偏重於煤、鐵、黃豆油及其他機械化工業的發展。

二十世紀後，中國人也開始在外人租借地及殖民地開始經營日用品工業，非生命開始應用於傳統的手工業上。第一次大戰期間，由於歐洲之進口停止，這些工業逐漸擴大，雖在一九一三到一九二〇之間，進口機器激漲數倍，亦無礙於其擴充。總之，到民國八年，中國對於非生命力的運用，已經有一個開端了。

近代以前之中國人，通常把資本投資於土地以求安全；投資於高利貸以求快而高之利息，投資於房屋、衣服、古董、可享受舒適而氣派的生活，即連經營順利的商人亦寧願從事此道。因為貿易及製造工作必須經過一連串的賄賂，還要受貪官污吏的勒索敲詐，就在這種循環剝削的經濟制度下，資本的累積也就幾乎其微了。

民國八年以前的現代企業大部份由外人出資，但是在一八七二到一九〇〇期間，許多外國洋行的代辦及一些獨立的中國商人，在通商口岸上開始發展他們自己事業的很多，並被華商受益於李鴻章張之洞的「官督民辦」政策，但是儘管有此政策，私人公司的投資額很難累積，因為每年需付高額的股息（中國人很少把股息再行投資），而減低工資或以紅利發展企業亦屬困難，即使外人把紅利再行投資或華僑加入投資，也因賠款、借款抵銷掉了。所以，一九〇〇年以後，儘管現代發展資本的方法傳入中國，儘管政府鼓勵發展工商，至民國八年，個人投資額還是無法增加。

民國八年以前，中國沿海河況及運河汽船、內燃機等新式行駛，加上六十年前已有的七千哩鐵路的建築，使貨物大肆流通各地。在民國八年這一年中，幾乎有五億美元價值的貨物輸入中國，在國內又有許多新設工廠之產品問世，這些貨物及產品只是銷於少數都市及其近郊，後來漸漸深入窮鄉僻壤，另一方面，近代交通也促進傳統產品的變動，迅速而廉價的運輸使經濟作物及鄉村家庭手工業大量的生產及外銷，因此民國八年前後，貨物的流通已增進很多了。

西方商人把公共服務獲得傳到中國，這些東西如銀行、保險、運貨、銷售及會計與合理化的管理等，中國很早就有，只是水準很低，傳統下的銀行代理權獲得傳達匯票、期票及票據交換、收送公債、國內兌換的管理等，但來建立一幢收受儲蓄及企業貸款制度的信用。中國

商人早就發展運載貨物的方法，但來未有一套如今日歐美航行的船舶或其他形式的保險制度。在大部分地區，早有一套廣闊而有效的水運制度，以馬車、二輪貨車及人、獸力車補其不足，但這些都嫌太慢、太昂貴而偏於地方性。管理方面盡由主人親自處理，而帳務方面，方法呆板，只能適用於小規模企業。

在通商口岸，西方人建立銀行和保險公司，他們的汽車可達各城，既快且廉，以此，他們把此城之物品裝到另外一城出售，他們且聯合許多買辦，傳達許多工作，後來這些買辦（中國人），得到外人的管理、記憶技術，參酌國情，成為近代中國經濟實業的先鋒隊。由於中國銀行對於國外貿易、現代工業及政府財政的政策不能勝任，這些任務都一一交給外國銀行來辦。一八九六年最早的近代銀行成立，民國八年左右，已有二個半官營的銀行及五十六個私人銀行，但是這時外國銀行及中外合營銀行仍控制金融事業，保險及水上運輸事業亦莫不如是。

至於海關事業，創於一八七五年左右，全由外人充任，彼創有效的海關收稅系統、現代的海港管理、航路領導及航海協助等。一八九六年，現代郵局替代舊式不實用的私營傳遞機構。到民國八年，中國的郵政，可說是趕上時代了。

（三）社會成員在空間上廣泛的交互行為，及對政治、經濟事務的多方參與。

中國有個慣例，官吏不准在故鄉服務，官吏的候補者，需經縣、省、中央的考試，兵役、服役由政府調動，而商人及運輸工人多不在本鄉經營。當政治紊亂變遷到極，經濟停滯時，人民多往鄰省或海外謀生，除了這些例外，中國人民很少離開鄉間。

但在二十世紀初期二十年，由於交通迅速及運費低廉，地域的變動性逐漸增加，內地的農人及小康之家移往現代化都市的很多（特別是上海）。年青人負笈前往都市或海外接受教育。內地的貿易增加，商人旅行次數也就增加。數百萬的農民移居東北、內蒙或南洋，他們深入窮鄉僻壤，與外界隔閡的程度，較諸百年以前，反見其增。

除了納稅人、士兵及勞工外，通常只有知識份子參與政事。至民

國八年，雖然軍官、商人新有勢力，但是知識份子仍舊斷政事，二十世紀初，雖稍有政黨的發展及選舉的產生，但並不普遍。經濟方面也多為地方性及簡單的直接關係，到了民國八年前後，就有一些較大的變動，許多人從事於工、商、實業、公共服務及現代經濟的國際市場之推廣，儘管如此，大部份的人仍未參與這些新的發展。

(四) 地方性的及世界的社會團體大群崩潰，以導致個人在社會的變動性增大及活動範圍的增廣。

傳統上，中國社會包括四個基本階層，即士、農、工、商。在士之上尚有享受特權的官吏階級，農下的而有一小部份被社會排斥之人（犯人或白癡）。但這個階級組織並不固定。大地主與大商人之間被諸地主與小農或巨商與小販多得很近。工商階級一得到土地，就是上階社會的一羣。雖然做官需經過考試，但是一個普通的農夫那末錢供給子女讀書？事實上，貧富之鴻溝是無法跨越的，幸而在傳統的制度上，官吏之子孫不盡皆能及遺產分配制度，使許多上層的家庭沒落。一直到民國八年，官吏的地位才被認為與醫、法、工、商相等，並非高而在上，而社會的變動性也可以加速自我改善的機會及增進空間的變動性。

不管那一階層，傳統中國的基本的社會組織是家庭，個人對家庭的責任超過一切，而宗族是最大的組合親羣，也是政府之下家庭之上的政治、經濟及儀禮的機構。由於傳統強調孝道，家族長輩控制他們的幼子，因此復原聽命於長輩之風通行全國。到了社會經濟發生變動的以後，年青的男女入城就職，才減免受監督的慣例，同時，近代的教育輸入西方思想，諸如個人自由、男女平等以及演變的不可避免性，更進一步減弱家庭的權威。民國八年以後，年青人開始有組織地反抗舊式家族制度，但是看得見的變動仍然甚少。其他傳統上的社會團體如秘密社會及存於寺廟、茶坊較不正式的團體，似乎仍保持舊時的狀態。

中國在經濟、政治、教育及其他各方面的近代化都需要加強個別的努力。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政府尚基於一般古典教育為能的觀念

去請勸官吏進入外交學校，這種觀念到了二十世紀就有改變，民國八年前後，對於行政及其他方面都需要專門的知識與技術一點，僅靠中國人心餘力絀，但已有普遍的認識了。

(五) 現世觀點的傳佈，科學知識的漸增，以及對環境獨立傾向的隨着教育程度而擴展。

一九〇五年，中國仿效日本廢除舊式教育及考試制度，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民國政府宣傳普通國民基礎教育並促進成人教育，但是驚人的教育費，民初政局的紛擾，阻止這種普及教育的進展。據統計，民國八年，中國有三百萬到五百萬的學生進入公私學堂，但這個數目並不比一世紀前進普學堂念古書的人數來得多，而且國語運動——白話文推行的先決條件，一直到民國十年才列入小學課程，而正式的成人教育計劃——晏陽初計劃，也一直到民國十二年才開始。由於一八六〇以後現代公學學校及一八九七以後西洋教會學院的設立，使中國人開始得到科學的知識。影響更大的是江南製造局及傳教士所翻譯許多理工書籍之出版，當時除了嚴復林紓兩位大翻譯家外，尚有從日本轉來許多翻譯作品，由於近代教育迅速的擴展，留學生的遞送，現代知識——至少是近代科學的基本知識，已迅速傳入知識階層了。

幾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抱着一種現世的觀點（secular view），而近代科學對於這點也只能逐漸增強，另一方面，文盲廣民，可能因為對於自然狀態的變化比較敏感（Vulnerability），因而比較缺少現世的觀點，這種情況，到了民國八年才有所改變。

(六) 廣密深入的交通網。

近百年來，大都市之間都有鋪石路、河流或運河相通。前面說過，一八五〇以後，列強一俟入中國內河，即有迅速而廉價的汽船運輸；一八九〇以後，即有鐵路伸入內地；一八八一電報傳入中國，入二十世紀以後，電報網就密佈全國了。

十九世紀末以前，即使是知識份子，對國外事情知道得很少，而其主要來源是行商、少數的旅行者及國外友人的通訊。報紙的傳入是

社會的現狀。

十九世紀後半段，大部份中國人所提倡的改革，都僅僅作為防範西人入侵的工具，而避免涉及根本的變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他們的口號，所借源於西方的知識，是用來加強傳統的價值，而非用來減弱傳統的價值的。當康有為憂慮中國之力已不足以應付西方挑戰時，作孔子托古改制說，把孔子認為一個改革家而企作改革時，彼當時與所有的保守官吏反對而罷。

其後，此腐蝕之信心終因受外力威脅及中國政權的瓦解而加緊起來。一九〇五廢科舉設新式學堂，而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之清室及專制王朝體系的崩潰，對於傳統的價值更是一個致命打擊。雖然時人對舊觀念舊標準仍保持大半，但在二十世紀初二十年間，思想上已顯得混亂不堪。年青學子學習西方思想與理想，望度國情，遂展開一種對傳統價值覺悟的運動。辛亥革命以前，梁啟超就大聲疾呼反對古代死法。民國六年，當新文化運動在北京大學發動時，陳獨秀即請求蔡先生（Mr. Science）德先生（Mr. Democracy）去趕走孔夫子，而胡適則認為古文已不足再產出生動的文學，應以白話文代之。民國八年，許多中國人開始懷疑傳統理想在現在和未來是否仍然有效，這個拒古而熱熱求新的傾向，在民國八年以後發展得很快。

在這裏，有兩個從前很會議的現代化社會條件來推論民國八年以前的中國之結論。

第一、以我們對那時期的中國歷熟了解程度，仍然不夠資格對此有確信，由此觀之，未知此已知重要，這個困難不在於資料來源太狹，而是在於有關資料的缺少聚合與分析。幸而此一知識上的大缺陷，現在已被與日俱增的中日歐美學者對此問題之研究研究所填補，蓋此問題，不僅史學家在研究，許許多多的社會科學家亦在作歷史的研究。

第二、民國八年以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是受限制的及變動得厲害的。或許，中國的交通運輸、人民、貨物及思想的變動性早已增大；國際關係、政治體系（局部水準的除外）及教育早有熱烈的改

變；知識份子，尤其是年青學子，在五卅運動之際，對傳統的評價已趨喪失；在沿海和長江中游各省，近代工商業及與其有關的服務機構早已發展；非生命力量已運用；都市及城鎮早已增大，但是，舊式宗族系統及更重要的傳統社會經濟團體並未變動，而且佔人口大部份的文盲農民的生活，並未見改善。

民國八年可以說是為中國近代化開路的一年，就某些部份來說，中國的近代化已邁進重要的階段，但是要走的路仍然還很長。

（譯自亞洲研究學報（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廿五卷四期）

（原載大陸雜誌第三二卷第八期）

宋史研究論文與書籍目錄

宋 晞 編

本分類目錄所收宋史研究之論文與書籍，以用中文撰寫者為範圍。計論文一、七四四篇，起自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迄至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書籍二三七種，皆以元以來之著作。未附作者索引，檢閱便利。

十八開本 壹百面

售價 國內 新台幣 叁拾元
國外 美金 壹元

經售處：聯合出版中心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七四號

近代中國社會的變化

黎威 (Marion J. Levy, Jr.) 著
馬武 譯

這是黎威先生所譯黎威氏所著「中日兩國近代化因素的比較研究」一大片裏面的一章，為全文精華之所在，全文過長，經濟傳播者同意，分章發表。

一、初步階段

「家族定向」(Family-oriented)或許是「傳統」中國社會中最具重要意義的特徵。理論上，通常每當族人作決定時，恆以他所屬底家族的利益為依歸。設若家族底整體利益和族人所參與底其他團體底整體利益立於對立的地位時，則家族的利益常被優先考慮。家族組織是個人效忠的焦點，甚至當族人和帝國官僚制度發生衝突時亦然。此外，家族組織也是族人日常生活底主要天地。繁文縟節，瑣屑的層級與眾多的家人，足夠他們一生揮霍。不論理論上或實際上，家族組織均構成一個獨立底生活羣體。中國底儒家學說，對這種型式底家族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根本重要的影響力。

在中國社會中，幸而有好幾個制衡家族制度的組織，限制族人於某一範圍內，以防止族人可能過度地犧牲他人的利益以成全本家族的利益。此類組織中，最顯明的便是鄉里街坊組織(Neighborhood Council)和行會(Guild)。這兩種組織是既非血緣的，又非法定的；它們是超家族性的組織，它們的結合力不如家族的強固。當這些組織如施壓力時，通常是透過家族組織間接地施於家族中的族員。在家族組織中，族長差不多君臨整個家族，對他權力範圍內底每一族人行使壓力；他是中國社會中權力上行和下行的中介。由於這些制衡組織的存在，「家族定向」可能底時形發展，受到有力的約束。

傳統中國的家族，不僅是個人理想中效忠的焦點，而且也是推動經濟活動底基本單元。一般中國家族，即「傳統」中國底一般農業家族，在生產和消費方面均自足自給。理論上，它們生產大多數自己消費的物品，也消費大多數自己生產的物品。每逢主要的物品和供應費的物品，必須從家族以外尋求時，則這種情勢通常被視為家族的「不幸」；此外，

假定還須支出房租、賦稅、利息等則更是家族的敗耗。甚至實質上，非自足自給底士大夫家族，也儘量減低它們對非族人充任生產者的依賴；它們至少在形式上扮成自足自給，它們役使準族人的奴僕充任生產者，並將和族外保持接觸底族人數字緊縮至極小值，以使它們儘可能地趨近自足自給底經濟型式。

最後，家族也是權力和責任分配運作底基本單元。族長為權力之源，一般族人甚少和外羣(They-group)的族人接觸，他們最耳熟能詳的是我輩(We-group)家族中底權力和責任分配底分割層級。設令他們參與族外某些有體活動時，這類羣體可能是親家族式的組合(Pseudo-family group)。族人一旦置身於此類組合中，當其受組合中的約束而服從此組合本身底功能命令時，也以各自底家族利益為主旨。家族是中國社會中最強固的基點，幾乎是各種型式權力底結構和輻射的中心點。這樣，無論從理念上或實質底經濟生活上，在中國社會底廣大基層上，滿佈了一個個近乎孤立底家族組織的點。它們既極缺乏橫的連繫，又沒有一個足夠強大底權力，以備隨時在家族組織崩解時，取代家族的地位，填補君主和個人間權力的真空。因此，中國社會中底家族組織，或許是造成相當穩定底靜態中國社會的主因，但無可否認地，它也伏下社會變動和解體的因子。

除家族組織外，在中國社會中，自然也面有一些和它不在同一層面上而相當重要的組織。這些組織，時常要求或適合個人作某些與家族私利相違或多不相符合的決定；其中最顯著最重要的，便是在它之上底帝國官僚制度。「傳統」中國社會正常功能的運作，在許多方面仰賴一些精心設計底行政機構。對環聚於水利系統(Irrigation system)中心點四通底一些問題而言，此種依賴尤為突出。政治權力，在統治階級「不擾民」和老百姓「天高皇帝遠」底「兩極互離」

原則下，很少下達至社會基層，除非發生破壞性或顛覆性的民亂。因此，在中國社會基層中，實際掌握的是家族制度而非官僚制度。

當官僚制度完全依循或趨近它設計的原樣運作時，家族的利益將格地排斥。當個人透過某種方式，通常是政試制度，擔任國家公

”，理論上他必須一心一意地忠於他的君主和他的國家，竭誠盡力採取超家族的利益，而將自己家族的利益置於次要的考慮。高度精

設計庶政制度是維持和延續官僚制度最有效的方式。設計這一制度的原意是多目標的。當清代統治時期，政府則側重希望依賴這個制

嚴格地約束族閥主義的影響，將個人從家族勢力的影響力下隔離；而，隔離的反作用力，有時反大於隔離力。這時，官僚制度將趨於

設若我們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作一鳥瞰，我們將隱約地可以發現中

歷史的演變在嚴格地遵循着一種特定的規律：朝代底興衰隆替是官
度的函數。即朝代的興替，是官僚制度一個接着一個的衰變和再

清代王室的命運也逃不出這個規律。清代中葉以後，官僚制度的

隨時間而遞減。加上中期以後，強大底外來因子不斷衝擊中國社會，並切割基層家族制度，促使官僚制度加速崩解。因此，至清朝

在內外因子交相衝擊下，龐大帝國組織的解體已變成只是時間或晚的問題了。

除官僚制度外，還有其他種種不同式樣和不同圍堵程度底友誼組織制衡了親屬關係過度發展。然而，假定個人面臨親誼和友誼間

益，成爲「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形時，則至少理論上，他將友而全親屬；家族是繁複社會活動底最後根源。但在實際所構成

動平面上，朋友佔據基本的地位。中國俗語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即係友誼的地位，在正常社會活動中，僅次於親

明證。家族以外某些非血緣的關係，時常傾向於擬家族關係而製親密的朋友視為「兄長」，老師視為「嚴父」，下層的祕密社會或上

謂不將收舉。這種以儒家學說爲中心所構成底一系列的關係，已

千年，成爲中國社會結構的主幹。但它們自清代中葉以還，由於

過度地畸形發展，終致紊亂了這個社會中許多縱行和橫行的關係，也弄壞了這個社會功能底正常運作，並破壞了各種型式關係間相互自助

鄉里街坊和行會透過家族組織對個人施加壓力，並或多或少地制

約了家族過度地尋求私利。當然，它們對家族所發生的制衡作用，有其限度。在中國這個社會中，家族優先佔性（Priority）是處身

在，有時也有將血族底親緣關係變成非血族關係的可能性，因為實際的發展，和社會底理想組織往往並不一致。例如當某一地方的大家

族，不僅財厚而且勢雄，則任何型式的組織，除政治性底強大壓力外，任何侵及其家族利益底一些行動，或警告其不得損及其他家族以

和本身家族利益的一些威脅，均將歸於徒然；抑有進者，鄉里的組織將完全受它的控制。情勢一旦發展至此，則此區域內其他家族的利益，

將此權門的利益是賴；它實際上成爲這個區域內真正統治者。這時，在而且只有在權門大家沒有必要犧牲其他家族的利益，或它的族

長存心仁慈，對其勢力圈內的各次經家族族人愛如子弟的條件下，各次經家族的利益，方可倖存。

從這些方面或其他方面比較中日兩個個業社會，常因使用「封建」一詞描述兩國社會制度，而使人不能窺見其真象，誤認為兩者

具有同樣底，或至少相似底社會結構。設令這一名詞習慣上是指謂：兩個個案社會中農人生活的困苦；或個人受到不開明的待遇；或貧富

則兩國的社會自可同被視為「封建的」；但「封建」一詞至少含有下

少理論上，相對於某一路而言，釐定個人對其地位高低或低底某

這些人問底主從關係，和在他底領主名義下，他和那個系統以外其他系統中個人問底相互關係；(4)財貨底供應與分配，尤其是土地的佔有

和控制，主要是依據權貴級中所佔據的位置而定。據此意義，則「傳統」底中國社會絕對是非封建的。本此意義，中國兩千餘年來實已是

非封建的國家，而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則是道地底封建國家。此一結論上基本差異的假定，在瞭解兩個社會何以獲取不同底工業化經驗這

點上，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事實上，在中國社會，設令產生變化底固

家族，不像這個社會中其他家族一樣，是極少自足自給的。他們既不生產出售的，也不生產消費的。他們想常來往各地和各種樣式的人接觸，所以他們的見聞較同時期一般社會中其他大多數人更為廣博。一般人或許會期待這些商業主義者能在工業社會的勢力逼近時，迅速地轉變適應新情境底理想人選；確切地說，他們或許能夠輕易地轉變成為西方近代社會中中產階級商人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這種希望終究落空。其所以如此，至少某些重要之點已敘述如上。

每當理想的和實際的兩種型態的企望，在個人內心衝突時，對於一個在實際企望型態方面已達飽和或接近飽和狀態的人，理想底企望型態常佔優勢。例如英國一些新興中產階級致力變成擁有土地的士紳，很多美國底政治領袖尋求成為商人。這種漸變時常歷時好幾個世代。在中國，士大夫式的家族最受入尊崇，所以經商致富的商人，和其他的中國人一樣，渴望開拓他們家族的遠景，以成為一個士大夫家族。通常他們可以採取兩種方式：挑選優秀的子弟接受儒家教育，以備參加致仕。如能因此而得官封爵，便可急速地提升他的家族聲望；其次是投資於土地。有了「財」，若無「勢」作為後盾，則「財」不穩固；有了「勢」若沒有「財」為之充實，「勢」便將懸空。所以「財」和「勢」的結合是這個社會中每一家族努力的目的。商人以外其他的家族，努力達成此目標的方式和商人不同，他們通過致仕制度，然後由貴而富，完成「財」和「勢」的結合。這兩種方式比較起來，由於一般人觀念一向輕視商人，故後者常佔絕對優勢，為中國社會流動的主流。設若社會流動的上流速率大於下流的速率，則久而久之新進權貴愈多，他們從下層括括的錢財愈鉅，因此使社會財富和權力分配的差距愈大，歷數代以後，社會的基層日漸薄弱，根本因之動搖，而社會的回春將繼之發生。

在「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中，最引人興味有許多特色之一，是社會中每位子通常要經歷好幾個階段社會壓力。這些壓力大約和一個八年齡的增長成反比：即年齡愈長，壓力愈減。例如男子在年輕的時候，父親管教最嚴，他不僅感受到從父親發出的強大壓力，還處處、

時時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來自家族中權力層級其他方面的壓力。父親所以對年輕男子特別加施壓力，予以種種訓練，是為了他將來成長後將能掌握家務並增進他的家族或他的家庭利益。當他一旦成為家長或族長以後，這類壓力將大為減輕，或全不存在。年輕的婦女，生活在雙親的家庭裏，設若經濟情況不佳時，她所處的境遇甚不安全，因為相對於她的兄弟而言，她只是家族底邊緣成員，尤其是對家族的未來而言。一位婦女當她為人媳時，她必然要受相當大的壓力，這些壓力有時比她在原家族中所受的要大得多。然而一旦她做了婆婆，在那個社會裏已因此而獲得婦女所能獲得底最大限度的解放，當然須假定當她達到那種地位時，她丈夫的家族或家庭情況一切正常。

「傳統」中國社會一些最基本的壓力因子，環聚於那個社會中最堅強的單元中——家族。這裏沒有時間對有關家族的問題作更詳細的敘述。我們一直缺乏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理論來解釋中國人先天的被虐狂（Inherently Masochistic）。在家庭中，最顯著的壓力是由於父子間、婆媳間、和男女間一系列關係的結果。其次是由於兄弟間、兄妹間底某些關係和婦女在家庭中底地位等的結果。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設若時機成熟，則將有足夠引起動機的因子，以摒棄或改變這種家族的型態。

在這個社會中，還有很多其他顯著底壓力來源。即今在豐收年成，由於人口數量的龐大，一般的經濟情況趨近於生存限度的極小值。設若是荒年，再加上官吏底剝削橫暴，則不論何種堅固的限界均將有被人民底洪流衝破的危險。都市居民和農民間的關係也是困難的根源之一。時常被農民視為勒索者（如地主、高利貸者、官吏、商人等），均為典型的城鎮居民。「傳統」中國底經濟結構是：城鎮居民的生活是由城鎮本身和農村維持，但農村居民却差不多完全依靠他們自己的生產。農村經濟是整個社會經濟的礎石，但大多數農人却認為質品和供應的交流只是單向貢納型的。當年成不好的時候，城鎮居民可能被農人認為是困難的製造者，而不問事實的真象是否如此。中國社會是一強大壓力的來源，而不同事實的真實是否如此。和作為社會礎石底家族壓力相隔離，事實上雖期長遠。反隔離的力量

大約和社會安定的時間成正比；即社會承平愈久，官僚制度變革愈大，換言之，貪污腐敗與時俱進。這並不是清剿獨斷，歷代均不例外。隨着官僚制度的解體，水利和交通系統也跟着失修，生產因而受損。由於官吏們不斷吸吮轄區內人民的財富和生產的成果，再加之商人的掠奪，人民的生活日益貧困，社會底層上下流動率因而銳減，惡性循環之發生。在政府權力真空的地區，有勢力的大家族成為那個區域內實際底統治力量，並主宰此區域內的人民。中國古籍謂：「苛政猛於虎」，人民將衙門比做虎口，於此可見人民對一個惡劣政府的畏懼和痛恨。一個朝代達到被人民視為「虎口」的時候，這個朝代遲早將在人民的洪流中覆沒。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對非工業社會所作底一些設計，使該社會似乎趨於相當的穩定。上面所敘述底大多數所謂「傳統」的型式，幾已歷兩千餘年的發展。際此悠長的過程中，範式朝代的混亂、衰替和新的循環不斷進行，通常循環一次大約歷時三百年。然而即令在朝代的盛世，社會結構中也含有許多壓力，由此我們可以假設：中國的社會結構自始即潛含了某些壓力，尤以家族的壓力最為顯著。它們可以自動地使社會底某些病症免症，例如對有背叛家族傾向底一些可能性，即予以有力地制約。因為個人的求職主要是基於「他是誰」，而不是「他能做甚麼」。設若某人背叛他的家族，他或他即被視為逐出家族因而和家族斷絕任何關係，這樣他自然地違犯社會所共同遵守底道德信條，而成為一個為社會所鄙棄的「逆子」。從此在這個社會中，再沒有他底容身之地，過着悲慘、窮困的生活，永遠在這個社會裏出頭。

相對於上面所敘述底在這個社會中許多更普遍的壓力而言，對於弊端底修正，該社會強烈地趨向於採取和緩改革制度的方式，而非革命式的激烈變革。關於此點，有兩點須加說明：第一，當政治清明的时候，這個制度可能是世界上所曾見過的最高效和最穩定底一種控制體系，也即是一種控制大規模高度分權制度的體系。因為構成這個體系的眾多單元，具有如此高度底經濟自足性，所以以她（中國）現有的工業技術，一個高度集權底中央政府勢難對散佈在廣大基層上的

每個單元，作直接而有效的控制；第二點，由於朝代的緩慢解體，人民常編織往日的盛世。更由於基本結構未從內部或外部發生基本的改變，所以這一體系強力地趨向於作某種程度的修正，以期返因它設計的原樣，而不是將此體系作大幅度地激劇變易。這種趨勢，因一些傾向於維持現狀的士紳，力主對地方上的時弊只作某種程度底和緩修正而更為增強。

二、過渡階段

近代中國社會底過渡階段，含有兩個變化的根源，它們直到今天還在作用着。中國社會底合成階段，相對於本文所論列的各點而言，是因為遭遇到底兩個強大的阻力：一是「傳統」中國範式制度的解體，尤以官僚制度為然；另一個是那些被引進中國的新力量，挾帶了近代西方工業化底社會型式，它們和中國底很不相同。官僚制度的解體，上面已經描述過。清代晚期，由於政治腐敗和經濟的困頓，終被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使用武力推翻，而改建與中國原有君主政體完全不同底共和政體。當復者開始改革他所承繼過來的國家時，却比前期改革者遭遇了更多的問題。共和政府須要解決政治制度解體，道德或價值標準的紊亂及新力量使他所形成底其他複雜問題。新力量至少暫時被阻止而回復到原有的情勢，但舊文化的惰性能可使新情勢底適當處理顯得特別困難；新舊兩種力量相互抵制，使近代中國的領導者無法更成功地處理這個混雜底複雜情勢。共和政府並未成功，而亦色政權也尚未有任何徵兆顯示出它能夠正確地處理這個綜合底複雜情勢。就中日兩國力求工業化而言，他們面對着某些不同問題。兩國各有他們的有利點也各有他們的不利點。兩國的有利點是：他們可以購進最新的工業設備，以省下游展這些設備底複雜過程和鉅大的耗費；可以吸取西方已成的工業化經驗；還有，就是他們廉價的勞工。然而兩國也有共同的不利點：即技術和經驗的缺乏，另外就是他們底人口問題。他們既面臨人口爆炸的威脅，但與他們比鄰的邊界各國又沒有一個足夠廣大的空間，消納這些過量的人口。